

从180个视角看中国

本报记者 高爽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国内人文学术出版的一大品牌,也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最重要的产品线之一。截至2018年10月,已出图书185种,在编及在译选题数千种,每年仍有新选题不断遴选纳入。其所出和待出的图书,可谓本本皆为优中选优、精中选精,反映了海外中国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一套30年里中国学界无人不读的丛书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文化热方兴未艾,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成果成为潮流。1981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规模之宏大以及品质之高一时无两,由此掀起了国内众多出版社翻译海外学术著作的热潮。也是在这个大潮中,198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本着“做一套好书,走向全国”的目的,率先译介推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希望借“另一双眼睛”看中国,以此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国学术的国际化进程。

包括《中国的现代化》(罗兹曼主编)、《中国

传统与变革》(费正清等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余英时著)、《寻求富强》(史华兹著)、《儒家思想新论》(杜维明著)等著作在内的第一批译著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者中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经过30年的努力,180多种高质量译作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成为当代中国出版的奇迹。这套丛书所出图书涉及中国从古及今的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思想、宗教、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可谓内容宏富,包罗万象;作者囊括了海外特别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研究专家,如早期的拉铁摩尔、费正清、列文森、史华兹等,中生代的孔飞

力、易劳逸、魏斐德等,目前的中坚力量宇文所安、彭慕兰、周锡瑞、滨下武志、池田知久、冯珠娣、薛凤等,另外还有旅居海外的华裔著名学者如萧公权、杨联陞等;译者,则荟萃了一批国内人文社科领域的一流学者,如雷颐、何兆武、钱乘旦、陈谦平、陈红民、唐晓峰、李明欢、纪志刚、高晔等。

对这套丛书的影响,南京大学教授程章钊这样总结:“这套书涉及面很广,包括中国研究的各个方面,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没有一个认真严肃的学者没读过这套书,只是读得多还是少的问题。”

读者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切

丛书的出版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赢得了喝彩,未见得就能赢得市场。“在丛书的第一个十年里,出版社一直肩负着巨大的经济负担。社里也曾有过停止出版的想法。”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傅建明说,“到了2000年以后,丛书的市场情况有了很大好转,社会各界的反应越来越好,重印率在90%以上,几乎所有的学术专业书店,都把这套书当成看家书,设有专柜。”

作为30年间这套丛书唯一的主编,清华大学国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东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坚持:“这套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丛书,当然是一项值得称道的成就,而这项成就的取得,也当然要归功于他们罕见的耐力,归功于他们对于

学术的热忱。30年来,这套丛书经历了五任社领导,也一直背负着相当的财务负担,可这些出版人不是矢志不移,而且还越干越带劲,越投入了。也正是因此,在这个创办30周年的日子里,我最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出版人比我自己更兴奋。这正像我以前打过的比方:你刚把一杯咖啡端起来时,那意味着大概你要提神;而如果你把它端上两个小时,那大概你是在发呆闹失恋;可要是你把它整整端上30年,那么,就连你自己都已修炼成文物了!”

对于蔚为大观的译者队伍和读者队伍,刘东同样表示了感谢:学术翻译本来就不轻松,本来就属于为人作嫁的功德,更不要说现在还有个怪现

象,再差劲的学术写作都能申报成果,可再优秀的学术翻译都不能。即使这样,还是有前后不下200个译者,共同支撑起了它180多个选题。无论如何,大陆学者既为众多,又不怕吃苦,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这种成功的获得,还必须背靠巨大的汉语共同体——我们所拥有的堪称海量的读者。丛书的成功,仰仗广大读者对学术的热爱,以及通过这种热爱又可以看出来的他们对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抱着怎样的好奇与关切。在这个意义上,才是这套书的强大民意基础,也就是说,这些读者是把手中的钞票当作选票,在他们有权作出选择的图书市场上,向我们的出版项目投了赞成票。

用多重视角和多种维度来看待中国问题

“我们引进的不仅仅是一批书,而是一个知识领域、一个学术传统。”刘东这样评价这套丛书,“我选书的目的,简单说只有一条,就是它激发了我,有举一反三的可能性。我读一本书,就期待它很过瘾,很刺激我,这就来自于文化的异质性。”

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徐海表示,希望用多重视角、多种维度来看待中国问题,这是我们当初的理念。这180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至少180个看待中国问题的视角,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引进了一个全新的知识增长点,打开了中国学者相对封闭的眼界;二是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出人意料的研究领域,拓展了中国学人的

视野,让国人知道学术原来可以做得更精彩;三是中为西学、洋为中用的交互过程,为中外文化的交流架构了更为宽阔的桥梁。

30年,180多种图书,蔚为大观。逐一介绍显然并不可能,仅选择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几种,拣选著名书评家的评论作以简单介绍:

《中国与达尔文》:我们相信,人定胜天。人可以改变自然,自然出了问题,人还能够补救它。这种想法的根源,我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媒体人梁文道)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将长时段的视角及计量学的方法引入到中

西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新的近代经济发展图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当时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

《儒教与道教》: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解读中国,虽被同行称为“伟大的外行”,但其中它对道教的出世与入世的探讨在今天读来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南京大学教授孙亦平)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拉铁摩尔对“边疆”进行了重新定义,并且对长城地域的广阔、不稳定的社会特性,及其在两种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从而提出独到的“贮存地”说。(历史学者岑丽春)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套见证了改革开放历史的丛书。能够坚持出版30年,并且愈发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是出版方和国内学人共同的坚持。而这种坚持,让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海外汉学著作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线。30年,180多种图书,给我们提供了180多个观察中国的视角。



书单

用记录对抗遗忘

你有细心听家人聊过家族里的往事吗?答案应该是——没有。或许是你没有耐心,去听上一辈人的故事;抑或是你和自己家人疏离,懒怠听他们唠叨年深日久的过往。

流水的庸常里,又怎能没有记录?无论你此刻沉静、伤感、欢欣、忙碌,还是闲适,记录都是抵抗遗忘的良药。

本期推荐两本书都和记录有关。《是梦》一书的作者张哲,也和我们一样,疏于记录,一直觉得自己的外婆没什么特别,直到看了外婆70年前的毕业纪念册后,他才知道外婆也曾有过年少的时光。在与外婆多次长谈之后,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外婆。他把外婆的故事记录下来,写成《梅子青时》。这本回忆录改变了张哲对待家人、对待过往记忆的态度,3年后,他又写下《是梦》一书。这是一个家族近40年的往事,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起的中国市民社会生与死、离与合、烟与尘的记忆。

还有吴茂华《草木之秋》里记录的日常,我们可以从妻子的视角,还原流沙河……



《是梦》

这是普通人的故事,讲述了人生之难、人生之好、人生之不可追。在这个故事中,命运有看似平淡实则令人心惊的伏笔,但阴影中亦有光彩与和煦。故事始自2016年,地点为杭州,讲述一个家族近40年的过往、今事。姜家第一代的君山、素兰,第二代的颂云、炳炎、天成、雪颖,第三代的嘉嘉、姜远、婷婷、老虎……故事的内容是他们目光所及的人世和彼此。



《草木之秋》

本书是关于晚年流沙河的真实而丰富的资料。分为《生活篇》《交友篇》《文事篇》《片语篇》《行旅篇》,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展现这位诗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其中不乏首次呈现于读者视野的细节。作者吴茂华本人也是一位作家,她从一个妻子同时也是亲密友人的视角,以几十年朝夕相处的生活为底子,书写出了一个同样至情至性的流沙河,并勾勒出他表层生活之下的心灵图景。

特殊解放区时期的大连

张占斌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大(今大连市)并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四年一个月零八天。这一历史时期的旅大地区被史学家称为“特殊解放区”。由王元新、王万涛主编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大连特殊解放区》一书,正是对这段历史的系统研究。

大连特殊解放区的建立,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复杂激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产物。为粉碎国民党的战略企图,中共大连市委在日本投降后仅两个月时间里,就在苏军军事管制当局非公开的支持下成功组建并掌控大连局势,旅大地区由此成为苏军军事管制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解放区。

在旅大地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建立起市、县民主政权,警察武装队伍、工会妇联组织,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奠定坚实基础。根据东北局指示,大连市委确定了“巩固旅大战略要地,建设我党隐蔽后方,发展生产,安定民生,支援前线”的工作方针,成功完成了对城

市的接管,整顿社会秩序并迅速恢复生产。

旅大地区之所以被称为特殊解放区,是由其有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解放区的特殊性决定的,即在苏联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条件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中国共产党尚未夺取全国政权的形势下,在一个局部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并实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特殊解放区不仅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大连特殊解放区》一书多侧面研究和记录了这段历史:一是特殊解放区时期建党、建政、建警的过程和历史贡献,二是特殊解放区时期创造性经济建设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三是新文化运动在旅大地区的开创奠基及中国革命文化由农村向城市进军的壮举等。这是一部系统记录大连特殊解放区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史学专著,填补了解放区研究的空白,有助于我们从这段历史中感悟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环境下的砥砺前行及其责任担当的风范。

经济恢复和发展是该书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对书中经济部分重点进行了阅读,在经济史方面有很大收获。

大连解放初期,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基本瘫痪。1946年6月,国民党对旅大地区实行经济封锁。为应对这一变化,中共旅大地委作出《关于今后财经工作的决定》,在经济上总的方针是组织生产、发展贸易、支援前线、改善民生,并着眼于旅大地区在我党财经体系中的特殊性,强调发挥两方面作用:一是发挥大连港的作用,二是发挥大连市的作用。

由于处在苏军军事管制之下,接管工作十分复杂,经济发展有很多困难。当时,旅大地区的企业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地方政府接管的工业企业,二是中苏合营企业,三是军事工业企业。中共旅大地委要求,在经营方式上,公营企业把握重点,集中资金与干部去做;中小企业放手交给私人资本和合作资本分散经营,形成多种经济形式共存的局面。

大连特殊解放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

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在经济建设方面,确立工业经济的主体地位,采取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发展模式,开展革命性实践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劳资双方的生产积极性,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建设管理和企业运行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在农村通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极大提高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

1947年至1948年,大连经济建设工作纳入计划轨道。1947年,关东公署成立经济计划委员会,旅大地区实施了《关东地区一九四八年经济建设大纲》。这是民主政府建立以后第一个比较成熟的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制定了发展工业、农业、渔业、盐业及加强贸易工作,保障粮食与工业原料输入和成品的输出,节省开支,保证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规划保障措施。经过大连人民两年的艰苦努力,旅大地区形成社会主义性质、苏营和中苏合营企业、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经济五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形式。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金龙飞舞

华夏得

福